



重庆陶研文史

Chongqing Historical Research on Xingzhi Tao

2003 · 4 (总第 12 期)



吴树琴女士生前

主 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 庆 市 育 才 中 学

CHONGQING TAoyan WENSHI

教时代落伍的人一起赶上
时代的前线来，是普及教育运
动的目标。

主管: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主办:重庆市陶研会文史委员会
重庆市育才中学
顾问:徐仲林 张再为 贾培基
胡北淇 赵义熙 文履平
主编:李 亮
副主编:邝忠炽
责编:杜东平
编委:李 亮 邝忠炽 唐祖蓉
李一林 李仕海 殷学绮
杜东平 徐宗梁

校 对:罗春秀 邓 茂

准印证:
渝内字(01)-(062)号
出版单位:
《重庆陶研文史》编辑部
地 址:
重庆市谢家湾正街 92 号
重庆市育才中学内
电 话:023-68662984
传 真:023-68822468
邮 编:400050
出版日期:2003 年 12 月

目 录

二〇〇三年第 4 期(总第 12 期)

悼念吴树琴同志	(1)
●校长风采	
校本教研——推动新课改之路	李 亮(3)
●行知思想研究	
生活教育发展史纲	戴伯韬(6)
●学陶师陶	
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刘季平(12)
《金陵光》与大学时代的陶行知	金林祥 杨建华(20)
永刻脑海中的三幅画像	李传玺(25)
怀念我的三位老师	杨应彬(26)
当今教师仍需弘扬陶行知的师德	张恒传(30)
一位鼎力相助陶行知的女同志	
——周宗琼	肖鸣锵 樊永蓉(35)
●教研教改	
案例教学法在中学生物教学运用的理性思考	杜东平(36)
学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思考与尝试	罗宏丽(38)
重视实验教学,提高学生能力	谢大敏(42)
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深入开展研究性学习	何生宏(44)
●学生作品	
陶老,你在哪里	蒋有芳(50)
七彩育才,七彩人生	邹 莉(51)
追寻精神家园	张凤鸣(52)
●校友回忆	
忆铭勋,话“育才”	李能寿(53)
搜查育才之夜	刘代良(57)
难忘母校育才情	
——怀念与校友李国常同在育才的日子	何方容(60)
进育才学校前前后后	杨岫岚(62)
我是个小话剧迷	张鸿眉(64)
苏联全国明晚聆听中国儿童歌声	摘《新华日报》(66)

● 行知思想研究

悼念吴树琴同志

一、吴树琴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好党员、中陶会基金会顾问，地市级离休干部吴树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2月4日在南京逝世，终年88岁。

吴树琴同志从早年就开始追随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宣传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倾注了毕生精力，多次受到中央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为《陶行知全集》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1983年吴树琴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来到重庆市育才中学、合川育才学校指导陶研工作。她无愧为陶行知先生的好学生，我们学习的好典范。在此向她表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致以真诚慰问。

二、吴树琴同志生平介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地市级离休干部吴树琴同志。吴树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2月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8岁。

吴树琴，女，汉族，1916年1月25日生。安徽休宁县溪头村人。大专学历，194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1987年6月6日加入中

国共产党。

吴树琴同志1923年至1927年在安徽休宁县溪头村私立缉熙小学读书；1928年至1934年在安徽隆布四女中师范班读书；1934年至1938年在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读书；1939年3月至1946年7月，协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宣传“行知教育思想”；1946年7月至1949年4月在原中央大学卫生室任药师；1949年4月至1955年3月在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保健科任药师；1955年4月至1959年2月任江苏省劳动局副局长；因响应党的号召，本人要求下基层工作，1959年3月起任南京制药厂副厂长；1979年11月离休。

吴树琴同志1949年至1962任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4年至1959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至1966年任江苏省妇联执委；1958年任第三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任第四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起任江苏省、南京市妇联常委；1978年至1982年任第五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至1985年任第六届南京市政协常委；1980年起任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理事、顾问；1986年起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顾问。

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981年在陶行知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又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接见。

吴树琴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药品匮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她应用自己所学的药学知识，参加研究治疗疟疾的药物，治愈了许多抗日将士，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在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残酷恶劣环境中，她不避风险，不顾自身安危，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爱国行动给予掩护和支持。

吴树琴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加入党组织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在72岁高龄之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热心参加党组织的各种活动，事事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一名大家公认的好党员。

吴树琴同志多年追随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并奉行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做人准则，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她宽厚待人，乐于助人，平易近人。心胸开阔、淡泊名利、顾全大局。离休

后，仍关心着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和敬重，充分展现了一个老干部的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操。

吴树琴同志热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担任人大、政协、妇联的社会工作中，积极参政议政，热心为群众服务，特别是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方面，她竭尽全力。在她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陶研会”，多年来，在担任中国和江苏省“陶研会”的工作中，她积极宣传和传播“行知教育思想”，矢志不渝，倾注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在85岁高龄，仍不顾年迈体弱，亲赴广州。她关心支持晓庄师范学院、行知中学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和教学工作，向师生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教育事业和培育一代新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吴树琴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党员，在沉痛悼念吴树琴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吴树琴同志的好思想、好品质、好作风，团结一致，奋发有为，与时俱进，把南药的改革与发展推向新的里程，再创南药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安息吧，吴树琴同志！

2003年12月10日

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随手抓来都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

《陶行知全集》

校本教研——推动新课改之路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李 亮

摘要 当前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将学校教研制度的改革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作者认为校本教研是深入推进新课改的重要途径,并从校本教研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制度建设等角度对校本教研进行了论述。

主题词 新课改 校本教研 制度建设

目前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将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新课程改革客观上也为所有学校划定了新的起跑线。这种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依赖于他们从广度和深度上对新课程的理解和实施的程度。如何进行教师培训,迅速提高教师的专业综合素质,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教师的成长是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可能先把所有教师培训好了再推进改革,而只有在改革的过程中采取措施,促使教师不断地发现问题,并通过研究、合作、交流等方式来解决问题,改善教学行为,最终实现专业水平的提高。而在众多的教师培训中,笔者以为,建立健全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以校为本的教研培训制度,构建多元开放的教学研究机制,是实现教师专业发展,推动新课改的重要途径。

一、校本教研是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
简单地说,校本教研是学校以课程实施过

程中教师所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为对象,以教师为主体,理论和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一种教学研究制度。校本教研的基本理念是:学校即研究中心,教室即研究室,教师即研究者。与现行的教研制度不同,校本教研是自下而上建立的,教师参加教研活动,是对自己专业发展需求的回应。重要的是,校本教研使教师感到培训活动是在有效地解决自己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空泛的理论说教,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兴趣,调动了积极性、创造力的发挥,这样就解决了一般的通识培训“只把上面的土刨了一下,而下面的土还很坚硬”的问题。

校本教研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校本性、科研性和人文性。校本性意味着校本教研是以改进学校实践、解决学校自身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为目标,而学校和教师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体;科研性强调校本教研本质上是一种科研活动,应该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性的、随意的研究;人文性则注重校本教研

以人为本、以生为本,追求的是学校的发展和师生发展的和谐统一。校本教研的这三大特征,彰显出它在新课程改革中的突出作用。

那么,如何实施校本教研呢?笔者以为,校本教研首先要做的是促使教师增强研究的意识,养成理论学习和实践反思的习惯。有人说过,一个有事业心和使命感的教师,理当作为教育的探索者,其探索的最佳途径就是从自我反思开始。教师要根据课改的目标,结合学校和个人的实际,选择和确定课题,结合日常教学活动,围绕典型案例或教学细节,用新课程的理念和观点进行剖析,把整个备课过程当作研究问题的过程,使日常教学工作 and 教学研究、教师专业成长融为一体,形成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职业生活方式。同时,要促使教师之间形成一种集体研究的氛围,强调教师之间的专业切磋、协调与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尤其是教研组、备课组要发挥纽带作用,创设机会和各种有利条件,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帮助每一位教师制订专业发展计划,促进教师不断反思,使课程改革与教师的专业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教研就不再是简单的备课,而是研究问题,这应当成为当代教研活动的新的交点。

有专家认为,建立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校长是第一责任人,校长本人要身体力行,同时给予教师制度、管理等方面的服务以及人文关怀,要通过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促进学校的发展,促进教师的发展,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学习化组织。

二、校本教研的价值

1. 校本教研促进教师成长

当前,国内外教育改革普遍认同的两个观点是:一、教师事关重大;二、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上。事实上也正如此,教师真正的成长不在于岗前培训,也不在于过程中的脱产培训,而在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我国众多优秀教师的成长过程无一例外地显示,在“课堂拼搏”中“学会教学”,是他们获得发展的重要历程。而建立“以校为本”的教研机制,就是这样一个促使教师“通过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中”获得专业进步的重要途径。

当前,教师的在职教育主要为短期课程、单元式研究、教学观摩和研讨等形式,这些培训对教师的成长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惯用。但客观的说,这些培训的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绝大多数的培训要么不深入、不细致,要么重理论轻实践,造成受训者领悟和接受的程度与培训预期目的之间有较大差距。而有研究者发现,教师在培训时,如参与校内同事间的互助指导,有75%的人能在课堂上有效应用所学的内容,否则只有15%的人能有同样的表现。这说明教师之间的广泛交流是提高教学能力很有效的方式。校本教研首先就是这样一种校内、主要是教研组内教师相互交流的一种制度。更重要的是,全组教师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对教学个案作典型剖析,使教师实实在在地面对每一堂课。另一方面,校本教研同以往的备课、教研方式不同,它实行研训一体,管训结合,充分尊重和发挥学科教学专家在教研中的作用,给予受训教师以必要的理论指导,避免了教研活动中的盲目性。事实也表明,专家、优秀教师和教师本人一起备课的方式是最受教师欢迎、收获最大的教研方式。

2. 校本教研是形成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支撑

办学特色是学校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也是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办学特色的形成,笔者以为必须具备以下几种要素,一是教育质量真正过硬,尤其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教育成果上具有鲜明

的独特性、丰富性；二是教师队伍建设成绩突出，教师群体中优秀分子数量充足，各类人才济济，而且教师发展有着宽松的外在环境，校园人际气氛自由和谐；三是学校整体发展底蕴深厚，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能够长时期的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厚实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而不是“昙花一现”。形成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但是从根本上讲，离不开科研的支持。当前，“科研兴校”已越来越成为许多学校的共识。但是如何走出一条立足学校、促进学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科研路子是许多学校尚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校本教研立足于“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以解决学校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教研对象，倡导“要用科研的眼光看待学校教学中的问题”、“要用科研的方法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客观上，校本教研不仅会促使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更会通过教师的发展促进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校本教研倡导具体化了的、实践化了的、教育理论的支持，并且主动寻求专家、校外人士对学校办学的支持，这对学校反思、规范自己的办学行为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校本教研的制度建设

要保证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必须探索出一种新的教学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以往教学改革“治标不治本”或“只闻雷声不见雨滴”的问题。

那么，需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教学管理制度，才有助于激发教师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呢？笔者以为，要建立教学管理新机制，必须改革过去在教学管理中对教师束缚太多的问题，要赋予他们关于教学研讨方面的自主权。要使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尽量少受或不受到某种习惯思想或某个权威势力的影响，提倡教师间的相互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在工作中发挥自己

的主见，做出自己的决定，真正上出自己的课。

同时，要创造有利于教师研究的良好氛围，使教师有机会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公开而自由的讨论，鼓励思维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加深教师对改革目标的理解。管理者要深刻认识到，在校本教研这个过程中，教师是作为研究者、作为主人来参与的，他是带着疑问与困惑，进行着理性地思考，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不应该以任何形式、任何权威来压制教师个人的专业见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到制度建设的内容方面，有专家认为，首先应该是理论学习制度，“要引导教师学会理性地思考教学问题；不要小看理论思维。”理论的指导是促进教师专业提高的有效保证，这种理论学习，应该更加指向实践中发生的真实问题。其次是建立对话交流制度，进行信息的交换、经验的共享、深度会谈、专题研讨。三是建立课题研究制度，尤其是小课题研究，结合教学实际的课题研究，是我们极力倡导的。学校应采取多种措施促使教师养成研究的习惯，校园内尤要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最终将校本教研切实落实到教师的日常教学中去，落实到学校教学改革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去。

总之，校本教研是深入推进新课改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在新课改的实践中努力探索实施校本教研的方式，力求通过教研制度的改革，促进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提高，推动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也希望藉此改革，转变我们的教育观念，革新教育方式，为学校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于重庆育才）

● 行知思想研究

生活教育发展史纲

——为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十三周年而作

戴伯韬

生活教育是在如下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一方面国内恶贯满盈的军阀们正在争霸称雄，鱼肉民众，国际的帝国主义者正在踏上第一次经济恐慌，企图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取得补偿而加紧剥削和压迫；但在另一方面，革命的怒潮却掀动了欧亚两洲，特别是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向北方迅速地进展着。这时，晓庄学校在南京诞生了。这是生活教育开始走上教育界，以新的姿态参加了战斗的起点。那时，革命的火焰弥漫全国，而南京犹在军阀盘踞中，但青年们抱着一颗改造中国的雄心，从燕、鲁、湘、鄂、川、浙等省来会者，凡十三人。在炮声震天，革命军围攻南京，奉鲁军阀溃退的那天，终于开学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接连几天的绵绵春雨之后，晓日忽然冲出云围，发出万道金光，普照大地，大家第一次穿上草鞋，从燕子矶小学出发，有的扛着帐篷，拿着绳索，到了布满小丘陵的晓庄山麓，搭起四座帐幕作来宾休息所，又向农家借了张八仙桌和几张条凳，排在荒坟旁，算是会场，连国旗、校旗也未能挂起。因为战事关系，来宾到者寥寥，只有几个乡下老头儿和孩子女人们，在投着惊奇的眼光，好象看把戏似的注视着我们这一群异乡人。我们的陶校长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皮帽儿站起来演讲了。大意是：“本校和别校特异的地方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只在空旷的山麓行开学典礼，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着的

是青天，下而踏着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要充溢于天地之间。所要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深信没有专能教的教师，只有经验较深或学习较好的指导员，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员。”

这所学校是很特别的。它以一个从未曾有过的姿态在人们之前出现了。依照创办人陶行知先生说：它要丢掉外国输入的教育方式，要在中国土壤中产生适合中国向前发展的教育。那时的想法是要提倡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这是主要目的，也是当时客观环境所形成的一种主观上的愿望。然而，从外国贩进来的洋化教育是不能给这种愿望以满足的，因为办洋化教育要花很多的钱，在穷的中国无法普及，这是一；其次是洋化教育的内容无补于国计民生。非但不能使人民富庶起来，而且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变穷。这种教育既然根本要不得，那么要负起以改造乡村创造新中国为己任的教育又应该怎样办才好呢？据当时的想法，第一要不费钱，易于普及；第二要能在实际生活上产生力量，改造环境。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它的具体办法即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生活的中心小学，这种

学校是和自然生活、社会生活联成一气的。“它的根安在环境里，吸收环境里的肥料、空气、阳光，化作自己的生命”。它能适应环境的生活，也能改造环境的生活。同时，“因为它是本地的土壤里产生出来的，它自能在相类的环境里传播。”所以到中心小学有办法时，再办师范学校。这样一来，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生活的中心小学；活的小学生产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生活力的国民。它是息息相通、互相关联、互相进步着的。所以中心学校随着自然社会生活继续不断地改进，师范学校随着中心学校继续不断地改进，地方学校随着师范学校继续不断地改进，自然社会生活又随着地方学校继续不断地改进。如此改造乡村，创造新的中国。晓庄学校就是根据这种理论创办的。这种想法虽是片面的，但他却包含着极大的真理性和进步性。

第一是它肯定了客观现实的存在；第二是它从运动不息的现实环境中去认识现实，把握现实，改革现实；第三是它承认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产生最高文化——教育，而这种教育又能反过来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生活。但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把教育孤立起来看了，没有把一切现象都看成一个互相交织、互相存在、互相关联的统一体。它虽然已经看到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与教育的不可分性，但它刚走进大门便停止住了。所以要一直等到后来，才发现这一方面的缺点，而把它弥补起来。但就上列各点看来，它实在是一个非凡的新教育思想，它已经孕育着后来才被发现的“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了。

原来，生活教育是从方法论开始的，那时候以为要实现上面的活教育，只有用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它认为过去传统教育之所以于国民福利无补，就是因为教师只教不学，不能教学相长，不能有所发明；就是因

为死读书不动手，不能生利，只会分利。同时，它认为人类进步完全靠两只手，手能制造工具，运用工具，创造工具，所以人类才有今天的文明，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也就在这里。因此，教学做合一的“做”是被特别重视，而且做了教学的中心。不久，“做”的意义便被阐发为：“在劳力上劳心。”一方面使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产生更高的知识，一方面认为人类的认识是先有行动，后有知识。小孩子见了火，手触着火之后，才知道火是烫的。因此，没有行动便不会产生知识；没有从行动中得来的知识做基础，便不能接受他人的知识。但如果进一步只有行动，没有思想，又成了蠢动；没有行动，只有思想，又成了妄想。所以只有在“劳力上劳心”所求得才是真知灼见。因而在认识方面，又有“行是知之始”、“接知如接枝”的学理地发现。

第三方面是：因为注重做，把“劳力上劳心”作为做的定义，这对中国士大夫们把教育看为神圣，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视为天经地义，予以有力的打击。它告诉我们“劳心”和“劳力”分家两方面都是要不得的。拿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劳力者，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然后万物之真理都可一一探获，人间的阶级都可一一化除，而我们理想之极乐世界乃有实现之可能。这个担子是要教师挑的。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努力上劳心的人类；也唯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可见得把知识和劳动统一起来的教育观，是一个非常的革命教育观。而它自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意义与要求。它之与社会革命思想逐渐接近，是可以预料的。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时既然这样着重做，那么到哪儿去做呢？到必有“事”焉上去做。所谓“事”，就是社会上的“事”，日常生活里的“事”。“事”在什么地方做，就在什么地方学，也就在什么地方去教。比方学游泳一定要到水里去，学种田一定要到田

里去。换句话说,活的方法就是要用活的环境,不读死的书本。要教学生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上去运用环境的活势力来培养自己的活本领。到了这里已经把“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基本原则完成了一部分,但仍没有提出“生活教育”这一命题来。那时候,人们正苦于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隔绝,因而造成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的怪现象。杜威认为只要把学校和社会、教育和生活两个东西稍微沟通一下就行。因而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说法。中国教育界抓住杜威的话实行起来,大喊“教育生活化”“学校社会化”。但化来化去,仍旧是一个行不通的口号。陶行知先生至此豁然贯通,认为杜威之错误在没有把教育和生活,学校和社会统一起来。因此没有根,仍站不住脚。于是他把杜威的话翻了半个筋斗!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但这个发现却不小,它大大地把教育思潮推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把“生活”和“教育”,“社会”和“学校”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才真正把教育的根,安到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环境里去而孳生发育起来,并反转来改变了自然和社会。当时对生活教育所下的定义为:“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的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就是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所以又说社会即学校。从此,跳出了传统教育的圈套,认为过什么生活就是受什么教育,但生活必须在总的方针下有计划地向前进行。

生活教育到了此时,雏形已具。但那时的目的,仍在想用教育来改造乡村,创造新的中国。它不过把“到实际生活和具体社会环境里去,运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来学习改造乡村的本领”,这一个根本概念,弄得更具体,更明确,更丰富,要进一步罢了。因此仍不能摆脱片面的改良主义的倾向和实验主义的渣滓。当时的师生,不但要亲自下田种地和管理一切生活上的事以及定期去访问农友,而且创办乡村小

学,设立乡村医院,中心茶园,中心木匠店,乡村运动场,乡村救火会,乡村武术会,乡村自卫会,民众学校,并组织晓庄剧社,倡导乡村戏剧,提倡修路和合作事业……在一面改造乡村,一面学习。我们称这一时期的生活教育运动为乡村教育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的成就有如下几点:

1. 开始丢掉输入的洋化教育,寻找适合中国向前发展的新教育;

2. 创立“教学做合一”这一教育法的体系,奠定生活教育在方法论上的基础;

3. 发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理论;

4. 因教学做合一这一方法的形成而有学友制的产生及清除师生间的界限,主张大家共教,共学,共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生活教育的理论,大致已略具雏形。当然,缺点仍旧是很多的。但它在另一方面的进步性与革命性却推动了它,改造了它自己,而又把它推进到与现实环境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去。以后是晓庄学校被封。

在表面上,这一教育运动暂时静止下来了,但留给教育界的影响很大,不单教学做合一已流传各校,而且掀起了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这时期的生活教育象一粒种子似的静静地躺在泥土里,一面吸收外来的阳光、空气、养料,充实自己,壮大自己,一面又从泥土里生长起来了。先是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创办自然学园,设立儿童科学通信学校,从事科学下嫁运动,想把自然科学普及给一般大众和儿童。当时的想法,以为要改造国家,把中国的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上去,非普及自然科学不可。这一新的姿态,在形式上似与前一期的乡村教育运动无关,但仍和“改造国民,创造新中国”的思想一脉相承,因为这一运动的目的,仍不外培养有活力的国民。因此不久便在上海树立起山海工学团的旗帜。什么叫工学团?据陶行知先生的解释为:

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

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是包含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细胞。

“工学团可大可小，从几个人的家庭、店铺，几十个人的学校、庙宇，几百个人的村庄，监狱，几千个人的工厂，几万人的军队，都可造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工学团。”

这时，适当“九·一八”之后，中国已从半殖民地的地位日渐沉沦为殖民地，国亡无日，人人感奋，这时期所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科学”与“团结”。主张整个民族必须很快地实施下列六大训练才能挽救国家。

1. 普遍的军事训练；2. 普遍的生产训练；3. 普遍的科学训练；4. 普遍的识字训练；5. 普遍的民权训练；6. 普遍的生育训练。

当时，山海工学团设在上海郊外的乡村。有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棉花工学团……主要的意旨是帮助农民来改造他们的村庄，等到他们能独立以后又去创办他村工学团，如此和大众结合起来，以求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于是，从山海工学团为起点，便开始向附近各村普及这种教育。所用的教育方法大部分仍是继承以前晓庄学校的。不过在这里已有了新的发现，除提出“科学”与“团结”以外，更显明地标出不是为个人求出路的个人主义教育，而是为整个民族求出路了。

为了要使这种教育迅速地普及全国，在穷的中国如果用正统派的方法来进行，自然无法达到目的。因此而有小先生理论的发现。恰好那时儿童自动学校已在南京成立，新安儿童旅行团也在没有教师没有任何人带领之下旅行到上海。这更促成了这一思想。其实小先生被发现，不过是师生互教共学共做的一个引伸。等到一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之后，才大大地提倡和运用

起来，顿时风行全国。

普及教育运动以山海工学团为起点，之后就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而有普及教育助成会的组织，又产生即知即传的办法，提倡传递先生。把知识的火苗一传十，十传百地介绍到工人、商人及流浪儿童队伍里去。并在上海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有计划有系统地来鼓吹普及教育运动，提供普及教育办法，宣传小先生制。凡是这一切，都不过是想在中国极困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来迅速地普及教育。陶行知先生在这一运动中，曾提出“五千万匹马力的普及教育机器”这一意见……主张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普教上去，而有一条原理，三种力量，六面压力的有力的指示。一条原理是“即知即传”，大人教大人和小孩；小孩教大人和小孩。三种力量是：教育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教人民高兴一面求学；可以一面教人一面求学；不得不一面教人一面求学。六面压力是，一，教师教的学生必须有半数以上教人，才达标准；二，学生不教人，教而没有成绩，不得升学或毕业；三，家庭、店铺、工厂，任何集团中的知识分子对不识字分子不肯教人者罚“守知奴”捐；四，订立妨害进步罚款，使一般长辈，或有权者对于不识字的童工之求学不能阻止；五，城门、车站、码头及其他交通孔道，设立识字警察，检查行人能讲解千字课一课者放行，否则罚愚民捐铜元一枚，并追究其负责人；六，调查户口加入教育程度调查一项，使居留的人民不能逃避。

这一指示曾得到广泛的响应，而且一直到今天仍有其辉煌的意义。我们称这第二时期的生活教育为普及教育运动时期。

生活教育在这一运动中曾作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更丰富了它自己。因为从生活教育的观点看来，社会就是大众的学校，生活就是大众的教育，大众必须承认它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而许多普及教育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它在这里的具体贡献是：一，即知即传，提倡小先生制

与传递先生制；二，普及工学团合一的教育，即教一个人做现代人；三，特别提出团结救国，逐渐走上教育必须配合政治要求这一路上来。陶行知先生自己曾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教育……那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之所以失败，却是我自己的错误。我写那计划的时候，以为中国既系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便误认每年工业之进展，足以适应教育普及率逐年增高之要求，我们的幼稚工业在帝国主义高压未曾铲除以前，决不许我们存这种奢望，那时候我对于儿童和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彻底看破……现在我们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

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上逐渐走上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不是偶然的。按照“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学理发展，是必然有这种结果的。所以当日寇侵入关内，进一步想鲸吞我华北，北平学生首先举起反抗大纛，因而掀起光荣的“一二·九运动”之后，生活教育者便首先起来响应，组织国难教社，拟定困难教育方案，广泛地在全国推行这一教育运动，开展这一教育运动。至此，已经明确地认定社会的各部门是一个互相存在的统一体，把以前的缺点弥补上了。

从这时起，陶行知先生出国，开始海外工作，介绍小先生即知即传的原则给国际反侵略运动，在印度及欧美各地都得到广泛的响应，特别是被压迫民族。

“八·一三”抗战既起，全国教育混乱失措。过去传统教育之无能，至此暴露无遗。生活教育者认为彻底改革教育配合抗战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到来，立刻提出战时教育运动，

主张改革学制，改变课程，革新教育方法，加强政治教育和抗战需要的知能，一面拟定抗战教育方案，出版《战时教育》旬刊，鼓吹战时教育运动。一面在上海及武汉各地大规模地创办抗战知识训练班，以应实际需要。同时联合各地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团体推进这一教育运动，如积极参加抗战教育研究会、全国战时教育协会等团体及起草战时教育方案，使得这一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对抗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称这第三时期的生活教育运动为战时教育运动。在这时期，生活教育壮大了，它给战时教育作了最有力的支持，它给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生活力。它在这时期的贡献有如下几点：

一、集体主义自我教育的理论之发现，它给当时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以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并且随时追求真理力求进步以求战胜敌人的同胞，一个最经济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两年多来，这种教育方法已经广泛地被采用。

二、提倡发扬民族精神，增进集体意识，加强组织教育，以建立集体生活的教育，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教育。

三、倡导树立教育上的民主精神，提倡启发自觉性，反对教育上的权威主义和注入式的死教育。

四、抗战开始就坚决主张教育必须与抗战建国的需要相配合，因此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方面，曾力倡必须彻底改革，实行战时教育，坚决反对那些躲在百年大计的旗帜下实行逃避现实、贻误青年的传统教育。

所有这一切，已经引起世人极大的注意，而且已有一部分被采用了。这一个运动仍在开展着，它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为了加强这一力量，发展这一教育学说到应有的水平，生活教育社已于二十七年年在桂林成立，晓庄研究所也已成立，教育之本质的研究及生活教育的系统研究也已开始。而且开办了育才学校，在教育上作更进一步的具体研究。

这十三年来,生活教育从呱呱坠地一直到记者执笔为止,它是无时不在发展着的,环境和它自身都在对它作着不断的改正。它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据创始人陶行知先生说,他带着杜威的教育学说回国之后,到处碰了壁才产生生活教育理论的。它虽然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学说,但和前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这就犹如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学说翻一个身,完全成了一种新的有力的学说一样,它已经摆脱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纯从生物学法则说明人类自然性的缺陷。第一是它把对立的“生活”与“教育”统一起来了,认为生活的变化,就是教育的变化。所谓生活的变化,就是在一个主导的作用之下,即适应客观生活需要,谋生活向上的主导作用之下,使个体与整体通过生活形态所引起的变化。个体在客观环境中因接触刺激引起反映就发生变化。个体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生长,也就不断地和环境接触,发生变化。这种不断的变化影响了个体,改变了个体;同时个体也会影响环境。换句话说,就是环境改造了人,同时人又反过来改造了环境,而使生活形态也起了变化。前面所说的变化过程,也就是教育过程。这种变化不是单纯的,也不是自然的或被动的而是有知识思想在起主导作用的。关于这,我们到后面去再说。以上只是说明个体在环境中因接触刺激发生反映,引起变化,因个体不断生长,变化也就不断增长,因此改变了个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因为人不但是动物,而且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个体的人与整体分不开。个体的发展也就受着社会的极大限制,即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限制。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是某一特定社会里的产物呢。

生活教育的另一部分即“社会即学校”这一部分,却补足了这个要求。所以生活教育是根据儿童的生理发展和社会发展通过生活形态把教育实现出来的一种教育。这种实现,就是生活的变化。它之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竭力与政治需求

相配合,而有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战时教育等运动之推行,也就在此。

生活教育者是要钻到社会生活里去追求真理。追求哪一种真理呢?合于自然法则的,合于人类历史实践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怎样追求法呢?到现实生活中运用“在劳力上劳心”的方法去做。这里认识客观的真理,是以客观的世界的真实,及我们的思想对此客观现实的适应为前提的。它不同于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就是有效的东西,不承认有客观的现实和客观真理的存在,这是一。第二是它认为客观现实在人类脑子里重现出来,即反映出来,不是以纯感性的经验或象镜子那样直接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思考、概念、法则等的形成过程。而且是有理论和思想在起主导作用的。所以要在劳力上去劳心。这是它的认识论,和实用主义者也丝毫没有相同之处。不错,生活教育也着重实践,所谓实践就是做,就是行动。它进一步使我们验证事物的正确性,而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依照我们在事物中所知觉的性质而使用这些事物的时候,当这个时候,我们便是在确切的验证我们感官知觉的正确性或非正确性,如果这些知觉不正确,则我们关于这样的事物的可使性的判断也一定是不正确,而我们要使用它的企图也一定会失败。”这说明在行动之下,能够判明我们的知觉是否与事物的客观实在一致。这构成教学做合一中认识论的一部分。

综观以上各点,生活教育实在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局限于实际生活中有效经验之获得和以片面的生物学法则来作为教育哲学的基础,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教育是杜威教育学说更高级的发展,它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有力的教育学说。我们看了它的发展情形,就可明白一个大概的。

原载《战时教育》5卷10期
《戴伯韬教育文选》现藏镇江市档案馆

● 学陶师陶

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刘季平

编者按：刘季平同志是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教育部常务副部长、代部长、文化部顾问、中陶会会长，1987年6月病逝。他在2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由于受党内教条主义“左”的思想影响，给陶行知先生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几顶帽子。该文中对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德、时时教育着我们。

为了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有效地促进普及义务教育与加速培养人才，提高我国民族的文化素质，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我深深觉得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有关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令指示。在了解到全国各地、各方面努力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并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又听到有些地区或单位正在深入调查研究，大胆提出某些新的设想和打算之后，更是感到极为兴奋。我相信，这些只是一个崭新局面的开端，今后必将导致改革与建设更为全面迅速地发展。同时也想到，仍会有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求得解决。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除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充分发挥各地、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不断总结正反经验，继续深入展开工作外，还有必要认真研究和博采重要历史经验，作为参考与借鉴。在教育改革中，我觉得特别需要重视和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理论和实践。我这个想法不是轻易得出的。前几年已谈过，我过去是给陶先生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几顶大

帽子的共产党员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学习与思考，才逐步觉悟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是非常适合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的。过去那些看法不单不对，而且实际上，还需要有很多现代陶行知来参加当前的教育改革工作。现联系当前的某些实际情况与迫切需要，摘要谈谈个人在这方面的前后思想变化及主要体会。

一、为教育改革坚决献身的革命教育家

我们给陶先生扣的第一顶帽子是“改良主义者”，主要理由是认为他是“教育救国论者”。那是1928年夏，中共晓庄学校支部讨论定下的，当时我任支部书记，应负主要责任。1932年初夏，左翼教联在上海成立后，仍然这样看陶先生，当时我仍是主要负责人。1932年6月底，我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了几年马列主义理论，又了解到陶先生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一些情况，看法逐渐有所改变。1937年“八一三”以后，经过长期实际工作，才愈益弄明白，我们不仅不应误解他为改良主义者，而且应该看到他十分重视教育革新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认清他是为教育改革而奋斗终身的革命战士。

我是从他有关抗日救国的言论、活动及带

头成立国难教育社的事实入手，来重新研究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实质的。看出他不仅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半个跟斗”，而且他所重视的“生活”还和马列主义的社会实践越来越趋于一致，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各阶段主要历史任务前进，突出了最主要的革命实践，如抗日救国教育、民主教育等。事实上，他在这以前也早已把政治革命放在首位来强调了教育革新的重要性。如在1925年12月即曾经强调“内蒙革命应与内蒙教育同时并进，方能解除蒙民之倒悬”。其后在1927年8月在晓庄招待南京市教育局长陈剑修等人的致词中，更曾谈起：“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可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若再联系他拥护辛亥革命和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表现，就可以证明，他在后期固然是公然配合政治革命强调教育改革的，即在前一时期也没有否定或反对政治革命，一味强调教育救国。

现在中央号召我们要努力搞好教育改革，要把他看成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头等大事，是搞好经济、科技以至政治等改革与建设的重大战略环节，来切实抓紧。如果陶先生在世，他将如何对待呢？毫无疑问，他必将非常高兴，必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的实际需要，踊跃投身到这一历史洪流中来。而且从他过去早就下定决心、赤脚下乡、深入基层、与人民大众同甘共苦、为教育改革而奋斗的一贯表现看，一定会不计个人得失，竭尽所能，为此而“抬头乐干”到底。就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像陶先生这样重视并全心全意献身于教育改革的人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不仅如此，从他对待教育改革的基本态度来看，我觉得有很值得我们重视的特点。他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却从未简单从事；而是既有对教育

改革的高度献身精神，又能适应我国国情和历史任务，坚持“行以求知知更行”。这实际上也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了实践——认识——实践的路子，使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愈益走向进步。他之所以能从最初曾受王阳明、杜威影响的陶行知愈益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陶行知，即得力于此。他这种“行以求知知更行”的具体情况与经过，已有很多同志谈起，我不再赘述。我只想着重提一提，正是这种精神，是我们当前搞好教育改革所需要特加重视的首要问题。

现在全国各地已有相当多热心于教育改革的骨干积极分子，但从整个教育改革工作的实际需要来看，却不能不承认，为数仍然不够。首先教育改革本身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大事，它不仅要涉及整个教育战线，还与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因素有关，其中有些社会风习和教育思潮决不是一纸命令或三言两语所能轻易改变的。其次，教育改革的潜在力量固然很大，但要把它充分发动起来，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靠好些同志做大量细致工作。再者，在现有教育工作者中，仍有不少人认识不足，工作不得力、不得法，甚至还有人因种种原因瞧不起教育工作，不单缺乏献身精神，还不愿留在学校担任教师工作。此外，有些工作究竟怎么改？也需要边干边摸索，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不断去粗取精，总结经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反复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及时发现推广先进经验，并且切实改进、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等等以外，有些地方注意研究、宣扬像陶行知先生那样的典范，甚至建立“师陶园”，显然是大有好处、非常有益的。这是我国需要有众多现代陶行知的第一个理由。

二、是抓住了要害的教育改革家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实际上是指导当前教育改革

的基本方针。要贯彻执行好这个基本方针，必须搞清楚教育理论上长期争论不已的一个矛盾。教育必然要教书、读书，却又离不开社会实践生活。这样，在书本传授和社会实践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究竟以何者为主的问题。旧传统教育主要把以往的文化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所以要以书本传授为主，而忽视社会实践。我们要使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为了现实的实践需要，当然仍要教书、读书，但那只是为了用于社会实践，因而也就要联系社会实践需要，注重灵活运用书本知识，不能把书本当作教条，更不能脱离实践，以书为主，死教死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党过去就曾有过十分深刻的教训，并曾专门作过总结，开展整风运动。新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培养了不少新的人才，但这个矛盾问题却至今还为能彻底解决，并在好些场合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后果。如在不少重点学校、不少非重点学校和不少农村学校内，都存在着好些不同程度的毛病与恶果。

为了解决好这个矛盾问题，我觉得我们也很有必要认真重视和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经验。陶先生是在经过一段实践检验之后，才毅然决然摆脱了王阳明和杜威的框框，强调“生活即教育”的。这不但可以对症下药，还符合马列主义者关于“实践、认识、实践”的道理。它的实质就是：只有社会实践生活，才是认识的源泉，即教育的源泉；才是最基本、最广泛、最持久、最主要的教育。因而在实践生活与教育、与书本传授的关系方面，也就一定要承认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要看到书本传授只是整个教育的一种方式，不能把教育仅仅看成书本传授、更不能脱离实践生活死读书。陶先生自己也重视读书，并未反对读书，但强调一要注重用书，二要用活。并借用墨子的话，把来自自己实践的知识称为“亲知”，把中外古今他人的知识称为“闻知”、“说

知”。认为“亲知”是根本，接知如接枝，“闻知”、“说知”要接活在“亲知”上，才能成为自己的真知。

我觉得，陶先生的这种思想，是使教育真能做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关键，是教育改革的要害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依旧脱离实际读死书，即使在口头上说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多半要落空。

而且我认为，陶先生的思想还符合我们党多年来有关干部与群众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强调社会实践生活是教育的主要途径，正是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我们千百万各级各类干部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走这条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相反，如果脱离实践死读书，把马列主义著作当作死教条，即使曾经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也要犯错误，对革命造成或大或小的危害。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能争取到有较长一段时期的和平环境时，可能有条件先好好进行一些系统教育，但仍然不能死读书，仍要坚持实践为主，仍要靠在实践中的锻炼，才能真正做到多出、出好人才。

因此，就不单不能给陶行知先生乱扣帽子，还要认真重视和研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抓好这个要害。这是我国需要有众多现代陶行知的又一重要理由。

三、是认清全局的教育改革家

当前的教育改革是从体制改革入手逐步展开的。事实上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大事。首先，既要继续办好高等和专业教育，负起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责任；又要努力抓好基础教育，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与条件，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还要适应实际需要，尽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切实加强成人进修教育与各种自学活动；逐步发展幼儿教育，等等。不仅如此，党和国家还早已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号召；亲自发动组织各部门、各地区，针